

009197

江西省志

江西省出版志

舒圣佑 主修

江西省志

JIANGXI SHENGZHI

总纂 谢军
副总纂 范银飞
刘斌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03-5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12月

主任委员 马继孔
副主任委员 方谦 刘建华 吴允中 石天行 王田有(专职) 姚公骞
委员 徐文楼 周奎书 俞林 傅文仪 李克 史宇谦 吴吉祥 毛云卿
万木 王朝俊 张运昌 廖延雄 郭皓 马巨贤 彭铎 余心乐

1991年7月

主任委员 吴官正
副主任委员 孙瑞林 周奎书 张伊(专职)
委员 朱英培 华桐 王明善 熊向东 饶少云 刘初浔 黄启曦 熊印辉
陈溪能 黄定元 杨淳朴 胡仲权 郑光荣 陈文华 高介福

1996年8月

主任委员 舒圣佑
副主任委员 黄智权 王飏 谢军(专职 1997.4.15起)
委员 雍忠诚 王明善 黄定元 叶春 熊向东 黄启曦 傅敏先 吴颐轩
郑如春 李国强 杨淳朴 黄庆来 刘初浔 朱祥清

1999年3月

主任委员 舒圣佑
副主任委员 黄智权 王飏 谢军(专职)
委员 雍忠诚 王明善 黄定元 钟健华 梁凯峰 黄耀春 傅敏先 吴颐轩
范光祺 李国强 朱张才 黄庆来 危朝安 刘伟平 刘积福 刘爱才
曹二俚 熊盛文 缪兵 韩景昌 徐明华 伍自尧 徐俊如 陈达恒

《江西省志》总纂人员

总纂 谢军
副总纂 范银飞 刘斌
总纂室主任 刘柏修
总纂室成员 俞红飞 何明栋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12月

主任委员 马继孔
副主任委员 方谦 刘建华 吴允中 石天行 王田有(专职) 姚公骞
委员 徐文楼 周奎书 俞林 傅文仪 李克 史宇谦 吴吉祥 毛云卿
万木 王朝俊 张运昌 廖延雄 郭皓 马巨贤 彭铎 余心乐

1991年7月

主任委员 吴官正
副主任委员 孙瑞林 周奎书 张伊(专职)
委员 朱英培 华桐 王明善 熊向东 饶少云 刘初浔 黄启曦 熊印辉
陈溪能 黄定元 杨淳朴 胡仲权 郑光荣 陈文华 高介福

1996年8月

主任委员 舒圣佑
副主任委员 黄智权 王飏 谢军(专职 1997.4.15起)
委员 雍忠诚 王明善 黄定元 叶春 熊向东 黄启曦 傅敏先 吴颐轩
郑如春 李国强 杨淳朴 黄庆来 刘初浔 朱祥清

1999年3月

主任委员 舒圣佑
副主任委员 黄智权 王飏 谢军(专职)
委员 雍忠诚 王明善 黄定元 钟健华 梁凯峰 黄耀春 傅敏先 吴颐轩
范光祺 李国强 朱张才 黄庆来 危朝安 刘伟平 刘积福 刘爱才
曹二俚 熊盛文 缪兵 韩景昌 徐明华 伍自尧 徐俊如 陈达恒

《江西省志》总纂人员

总纂 谢军
副总纂 范银飞 刘斌
总纂室主任 刘柏修
总纂室成员 俞红飞 何明栋

编纂说明

江西自清光绪七年(1881)《江西通志》刊行以来,省志已失修 100 多年。民国期间,虽设立江西省通志馆,并有馆长吴宗慈等人勉力重编,终未能定稿刊行。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 50 年代积极倡导修志,国家设立中国地方志小组总揽其事,但受当时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而成果甚微,江西仅纂成金溪、奉新等 16 部县志,未着手省志编纂。“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地方志小组停止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风起,国运日盛,中共中央书记处适时批准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后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先后颁发文件,重加倡导,修志遂成全国热潮。中共江西省委因势利导,于 1983 年 12 月批准成立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指导全省各地修志,组织省志编纂。1988 年 1 月省人民政府正式部署《江西省志》编纂任务。到 1993 年 3 月,全省大多数县、市已完成本届修志任务,新编《江西省志》的各种专志也陆续纂定付梓。

《江西省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全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正确估价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

《江西省志》由省地方志编委会统一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和审稿编排,由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头承编。为便于组织协调,加快编纂进度,突出江西特点,增大信息容量,提高使用价值,节约经费开支,《江西省志》采用丛书结构形式,侧重考虑各专志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分拘泥于全书的整体性。全书由大事记、各专志、人物志组成,各专志一般设序言、凡例、概述、专业内容、人物、大事纪年、附录和编后,分则自成一体,合为全省通志。志目设置方面,不强求“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基本上一个部门一志。例如,工人、青少年、妇女、工商、华侨等组织和台联、侨联、科协、文联、社联等团体,本应统合为社会团体志,为便利编纂,现多数分别立目,科协、文联、社联则依次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志中记述;旧政权志、苏区志、人民代表大会志、人民政府志,理当归并为政权志,考虑到旧政权与人民政权有本质不同,政权与政府有别,苏区又是江西的一大特色,故而分设四志;此外,从突出优势产业着眼,将铜业、钨钽铌业从冶金工业中析出,将纺织、陶瓷、烟草业从轻工业中析出,各自设志。内容方面,一些全局性内容和交叉性内容,允许

各专志从本专业角度适当记述;科技、教育既在科学技术志、教育志中作宏观展示,又在许多专志中作微观反映。断限方面,全书通贯古今,详今明古,侧重近现代,尤重当代。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业或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但不“一刀切”,有些专志视实际需要适当延伸。层次方面,大多数专志只设章、节、目,但某些内容丰富、层次复杂的专志,则设篇、章、节、目。版式方面,除统一封面、扉页和正文的字体、字号外,其他均依据不同专志的具体情况确定。

本书各专志中涉及全省的山川、面积、人口等基本材料,以地貌、人口两部专志的记述为依据,其他资料分别在各专志末详列所自。引文出处和需注释的内容一般在行文中用小字交代,注文过长又不便在行文中交代的用页末注。

本书各专志按脱稿先后发排,原则上一志一册,少数篇幅过小、不宜独立成册的则两志合为一册。除个别涉及机密的专志内部发行外,其他专志均公开发行。

《江西省志》总纂室

1993年3月(1997年6月修订)

《江西省志》丛书志目

- | | | | |
|------------------|------------------|-------------------|----------------|
| 1. 江西省大事记 | 26. 江西省陶瓷工业志 | 52. 江西省审计志 | 73. 江西省档案志 * |
| 2. 江西省行政区划志 | 27. 江西省机械工业志 * | 53. 江西省标准志 | 74. 江西省劳动志 |
| 3. 江西省地貌志 | 28. 江西省电子工业志 | 54. 江西省计量志 | 75. 江西省人事志 * |
| 4. 江西省地质矿产志 * | 29. 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 55.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 | 76. 江西省公安志 * |
| 5. 江西省气象志 * | 30. 江西省电力工业志 * | 56. 民主党派江西省地方组织志 | 77. 江西省武警志 |
| 6. 江西省地震志 | 31. 江西省建筑业志 * | 57.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 | 78. 江西省检察志 * |
| 7. 江西省测绘志 * | 32. 江西省乡镇企业志 | 58. 江西省工人组织志 | 79. 江西省法院志 * |
| 8. 江西省动植物志 * | 33. 江西省交通志 * | 59. 江西省青少年组织志 | 80. 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 |
| 9. 江西省人口志 | 34. 江西省铁路志 * | 60. 江西省妇女组织志 | 81. 江西省劳改劳教志 * |
| 10. 江西省土地志 | 35. 江西省民用航空志 * | 61. 江西省工商组织志 | 82. 江西省军事志 * |
| 11. 江西省经济综合志 | 36. 江西省邮电志 | 62. 江西省侨联志 | 83. 江西省教育志 * |
| 12. 江西省农牧渔业志 * | 37. 江西省商业志 * | 63. 江西省台联志 | 84. 江西省科学技术志 * |
| 13. 江西省农垦志 * | 38. 江西省供销合作志 | 64. 江西省政协志 * | 85. 江西省社会科学志 * |
| 14. 江西省林业志 * | 39. 江西省粮食志 * | 65. 江西省旧政权志 | 86.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 * |
| 15. 江西省水利志 * | 40. 江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志 * | 66. 江西省苏区志 | 87. 江西省艺文志 |
| 16. 江西省煤炭工业志 * | 41. 江西省口岸管理志 | 67.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志 | 88. 江西省新闻志 |
| 17. 江西省冶金工业志 | 42. 江西省旅游志 | 68. 江西省人民政府志 | 89. 江西省出版志 * |
| 18. 江西省铜业志 | 43. 江西省财政志 * | 69. 江西省民政志 | 90. 江西省广播电视志 * |
| 19. 江西省钨钼铀工业志 * | 44. 江西省金融志 * | 70. 江西省外事志 | 91. 江西省卫生志 * |
| 20. 江西省轻工业志 * | 45. 江西省城乡建设志 | 71. 江西省台港澳工作志 | 92. 江西省医药志 |
| 21. 江西省二轻工业志 | 46. 江西省环境保护志 * | 72. 江西省侨务志 | 93. 江西省体育志 |
| 22. 江西省纺织工业志 * | 47. 江西省经济计划志 | | 94. 江西省风俗志 |
| 23. 江西省烟草志 * | 48. 江西省统计志 | | 95. 江西省宗教志 |
| 24. 江西省石油化学工业志 * | 49. 江西省物资志 | | 96. 江西省方言志 |
| 25. 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志 | 50. 江西省物价志 | | 97. 江西省方志编纂志 |
| | 51. 江西省工商行政志 | | 98. 江西省人物志 |

(加*号者已出版)

《江西省志》丛书

江西省出版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7月

江西省出版志编纂委员会

1991年4月~1991年11月

顾问：张会村 武继国 葛铁铮 张 韬
主任委员：桂晓风
副主任委员：王治民 熊向东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延江 王治民 邓光东 帅雨发
刘起龙 汤匡时 李 英 张绍昌 张淑媛 范卫平
桂晓风 徐贤干 黄 奔 黄日星 喻建章 廖诗材
熊向东 魏文煊

1991年11月~1994年7月

顾问：桂晓风 张会村 武继国 葛铁铮 张 韬
主任委员：熊向东
副主任委员：王治民 刘国藏 梁凯峰 帅雨发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治民 邓光东 帅雨发 刘起龙
汤匡时 李 英 吴仁赣 张绍昌 张淑媛 范卫平
徐贤干 黄 奔 黄日星 喻建章 曾正德 廖诗材
熊向东 魏文煊

1994年8月

顾问：桂晓风 张会村 武继国 葛铁铮 张 韬
主任委员：熊向东
副主任委员：王治民 刘国藏 梁凯峰 帅雨发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治民 王植三 帅雨发 刘国藏
李福珍 张小石 黄日星 梁凯峰 熊向东 戴正越

《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主编、副主编

主 编：熊向东
副 主 编：王治民 刘国藏 梁凯峰 帅雨发
常务副主编：黄日星

江西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黄日星
编辑部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李 洪 吴山芳 张德意 郑高希
姜钦云 黄日星 龚平如

凡 例

一、《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志书的要求,采取详今略古、通贯古今的原则,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载我省出版事业的历史,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准确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现时的江西省行政区划为界,在尊重历史界划的前提下作出适当的调整。既注重地方特色、行业特色,又突出时代特色,详细记载苏区出版的历史,充分展现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出版事业的巨大变化和伟大成就。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前后在江西及毗邻地区设置过“江西省”、“赣南省”、“赣东北省”、“闽西省”、“闽浙赣省”、“湘鄂赣省”、“闽粤赣省”等,尽管这些政区的设置并不十分稳定,有的也越出了“江西”的范围,但《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则不受“省”界的限制,把中华苏维埃领属的出版活动都作为可选辑的范围,以保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史实的完整性。

四、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93年12月31日。1911年(包括1911年)以前采用中国传统历史纪年,在其后括注公元纪年;1911年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书编写体例遵照《江西省志丛书》行文通则的要求,又根据出版事业发展的历史特征略作调整;体裁上以志为主,辅以述、图、表、纪、传等表现形式,以便更好地展现出版历史的特征。

六、本志记载的机构名称、社会团体、会议名称等,在第一次记录时使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在使用历史地理名称时括注现在名称。

七、本志所记人物,采取“以类纪事、以事系人、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曾经为出版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给予立传,健在的重要出版人物或以列表的形式予以记录,或以“以事带人”的方式在叙事中记入。

八、本志采用记叙性现代汉语文体,叙而不作,记而不论,力求质朴流畅、条理清晰,力戒雕琢妄论。对历史专用语保持原有文字,不予简化。

九、本书所记建国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下同)出版物(图书、刊物、音像、电子出版物等)为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非法出版物不予收录。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新闻出版局及其有关部门。所引用统计数字,建国前是根据修志者所能掌握的材料为依据,建国后则出自江西省新闻出版局计财统计部门的数字以及其他部门统计数字。

序

“盛世修志”。《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问世，是一件只有在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时代条件下才能实现的盛事。

图书出版事业是一种社会文化事业，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而这种文化事业的成就，与地方文化遗产的积存、地方经济和科学教育及人才构成的状况相适应。在江西，自唐宋至明清，以不学为咎、不文为辱的风气大盛，书院教育特别流行，进士及第者前后相继，名宦学者辈出不鲜，恰似群星灿烂，光被四野。政治家如王安石，文豪如欧阳修，诗家如黄庭坚，理学家如朱熹，史学家如马端临，航海家如汪大渊，语言学家如周德清，军事家如谭纶，科学家如宋应星，戏剧家如汤显祖，医学家如喻嘉言，建筑家如雷发达，艺术大师如朱耷，禁烟名臣如黄爵滋……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的功勋业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其积极的社会效果，不仅有益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而且惠及子孙后代，并走向世界。他们有声有色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著作活动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他们的活动成果促进了江西出版业的发展，而作为积累和传播思想、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出版业，其推动社会文明、推进历史潮流的重要作用亦日显突出。对此，现在问世的《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全面记载了江西出版业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我们不仅从中看到古代江西出版业的发展轨迹，更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江西出版业的风雨历程，从而受到启迪，得到激励，努力做好今天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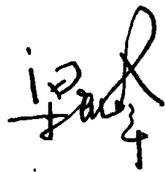
出版事业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在我国，当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出版事业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这一规定性就决定了，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出版方针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任何图书都不能避开政治性。我们现在常说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政治原则。出版工作讲政治，这是图书编辑工作的一个基本属性，是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的优良传统。在近代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乃至创建新中国的斗争中，不少烈士为完成革命出版任务而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新技术条件下，图书编辑工作过程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但是，像革命先烈那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的。我们这样做，并不否定图书出版工作的另一个基本属性，即传播和积累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我们恰恰认为，正是图书编辑工作这种独有的传播和积累功能，才显示出它为政

治服务的巨大作用。

业精于勤而毁于惰。江西古代、近现代许多发生重大影响的图书,无不倾注了著作者与出版者的心血和辛劳,无一不是书与人的结合、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被英国人称为“中国的狄德罗”(按:狄德罗是法国18世纪的著名唯物论者、科学家、百科全书的主编)的宋应星,冲破理学思想和八股科举考试的束缚,总结劳动群众的生产技术,写出了“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集中国17世纪技术成就之大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保存了珍贵资料。宋应星被后人尊称为“读书人面向生产的先驱。”当然,我们还不能忘记他的好友徐伯聚,是他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将《天工开物》刊印,才得以流行于世。江西出版业进入当代,凡是闪光处,也都是我们的先行者奋力实践的结果,他们在江西出版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以丰富的资料道出了一个真理:任何时代的出版事业要繁荣发展,关键在于要有高质量的优秀图书,而图书的高质量绝对离不开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现代编辑工作要求编辑人员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包括无私奉献的品德,开拓进取的精神,敬业乐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谨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的作风,此外,还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和专业修养,并不间断地学习和汲取新的知识。编辑工作不单是个体作业,它是个体和集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结合,每项成果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因此,我们不仅要有一批人才,有一支优秀的编辑出版队伍,同时要有集合人才的凝聚力,组成团结和谐的工作集体,以适应现代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

如上所述,江西是富于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蕴积的地方。开掘江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蕴藏,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刻不容缓的使命。精神财富的最大载体就是出版物。《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从图书出版这一重要侧面反映了江西璀璨文化的足迹。但是,我们不是狭隘的地域论者。我们并不陶醉于先贤们的名字给江西这块地方带来的殊荣,不是让后辈人躺在前人创造的精神宝库上进行阿Q式的“老子先前比你阔得多”的炫耀,也不是在当代的“寻根热”里凑热闹。承先为了启后。总结在过去社会条件下造成人才辈出的历史经验,作为当今从事江西出版工作、繁荣江西出版事业的借鉴。前辈的榜样给了我们鼓舞,但前辈的业绩不等于给我们签署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们正面临着21世纪的挑战,我们正面临着空前激烈的竞争,当代江西出版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祝贺江西第一部出版志的诞生,感谢志书的编纂者历时8年的辛勤劳作,但愿大家能从《江西省志·江西省出版志》中得到启发,引出思考,努力拼搏,开拓进取,高速度地把我省出版事业推向全国的先进行列。



1998年10月

概 述

(1)江西位于祖国江南腹地,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由于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和知识分子的努力创造,这里赢得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欧阳修曾满怀对故乡的深情在《送吴生(吴孝宗)南归》诗中赞叹道:“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的确,在这块土地上,出现过许许多多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一代接一代,开拓出源远流长的文化江河,灌溉过物质和精神的广阔领域。所有这些“材贤”,几乎都致力于著述编辑出版事业,为华夏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1973年发现,先后进行了六次科学发掘的樟树吴城遗址,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文化遗址,考古学界称之为“吴城文化”。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170多个陶文。这些陶文,有的能对照殷墟甲骨文辨认为田、五、十、中、祖、甲等字;有的是刀、镞、齿、戈、日、月和植物等象形符号。我国的图画象形文字体系,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以前,西安半坡遗址中有113个原始文字符号,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有130个原始文字符号,吴城遗址有170余个文字符号。专家认为,吴城的陶文,其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很可能是失传了的古文字。文字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一定的语言体系为基础,是进入文明时代——奴隶制社会的一个历史标志。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渔猎农桑,休养生息,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在共同的劳动中,形成了最初的语言和文化活动。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活动的交往和视野的扩展,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步提到更高的层次——文人学士的著述活动开始出现。据现有资料记载,江西籍人士的著述活动可以追溯到东汉中叶的经学家程曾(南昌人)。程曾受业长安(今陕西西安),习《严氏春秋》,建初三年(公元78年)举孝廉,任海西(今江苏灌南县)令,后还家讲授,其声望及于江东,受到吴、越士子的仰慕,会稽世家大族顾氏的子弟数百人常居门下求学。程曾著书百余篇,《五经通难》、《孟子章句》是当时著名的经学著作。

(3)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江西最早的一批记述地方民情风俗的著作,虽然原书均已不存在,但是从《隋书·经籍志》中可以看到部分书目;从宋乐史《太平环宇记》、元陶宗仪《说郛》、清王谟《汉唐地理书抄》等书中,可以见到部分内容。如《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列有《豫章烈士传》3卷(徐整撰),《豫章旧志》3卷(晋会稽太守熊默著),《豫章记》1卷(雷次宗撰,这是最早的江西地方志书之一,多被唐宋史家的著作征引)等,见之元《说郛》中有《安城记》(王孚撰),《鄱阳记》(刘澄之撰),《浔阳记》(张僧监撰),《临川记》(荀伯子撰),《南康记》(邓德明撰),《庐陵异物志》(曹步雅撰)等。

廉

震

(4)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实现南北统一。此后直至唐朝结束,三个多世纪中全国大统一,封建经济文化空前大发展。在此期间,江西地区与全国同步发展,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理优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经济文化特色,比前一历史阶段表现得更加充分。科学文化的兴盛,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绘画、雕塑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促使了雕版印刷的出现。唐大中元年至三年(公元847~849年),江南西道观察使钱干泉,编写并雕印了《刘宏传》数千本,寄送给朝廷、官宦及炼丹人士,这是中国道教徒雕版印刷及江西刻书的最早记录,也是江西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印刷物的记载。封建小农经济的日见繁荣,科举取士的刺激,推动了学校和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起,读书的人多了,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也多起来。光绪《江西通志》所录资料统计,唐朝江西地区考中进士65名。最早的进士是唐贞观年间的张文瓘、董申(都是德兴人),最早状元是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卢肇(宜春人)。卢肇对天文很感兴趣,潜心研究潮汐现象,综合前人的观点,“以二十余年前后详参”的结果,终于写成《海潮赋》及附件《海潮赋序》、《进海潮赋状》,于咸通年间进献朝廷。这是一篇具有哲理性的科学著作。他认为:“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虚系乎月也”。这是说潮汐的成因,与太阳、月球都有直接关系,这无疑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卢肇的研究成果名动至尊,受到唐懿宗皇帝的赞赏,称“卢肇文学,优贍时辈,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征引有据,图象甚明,足称一家之言,以去万载之感。其赋宜宣付史馆。”《海潮赋》成为唐朝国家保存的珍贵文献。

(5)唐朝在藩镇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下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中的吴、南唐继续统治着包括江西在内的江淮地区。那时,中原动荡,战争频繁,但在南方比较安宁。南唐是一个重视艺术的小邦,曾设教坊、画院,网罗词客画家,对江西文艺有深远影响,江西最早显名于世的画家董源和徐熙就是在南唐成长的。董源任南唐的北苑使,善用水墨写江南山水,尤工秋岚远景,平淡天真,一生作画百幅以上。他的传世作品《潇湘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横卷,绢本,淡彩;此外,还有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卷》(横卷,绢本)和台湾省博物院的《龙袖骄民图》(四拼绢大幅)。董源的画驰誉江南,是自南唐以来江西山水画派的鼻祖。与董源同是进贤人的徐熙,是南唐杰出的花鸟画家,《宣和画谱》所记画目,他的作品有259幅之多,受到南唐李后主的熏爱,集英殿藏徐熙的作品最多。可惜靖康之变后,绝大部分毁于兵燹。这里还要一提的是,南唐君臣雅爱词章,词坛中心人物,除李璟、李煜二主外,还有重臣冯延巳。冯延巳曾在抚州任职三年(公元948~951年),这位扬州人把词的种子播在了江西的土壤里,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6)宋代纸张生产的兴盛,为刻书业的发达准备了条件,而读书与刻书业的兴旺,又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读书、刻书、造纸三者的依存关系,使宋代江西人才并肩继踵泉涌而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资源,站到了先进者的行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评语,到了宋代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江西的造纸业在前代生产基础上有新的成就。吉州、抚州、信州等地的产品更为出名。南康军的布水纸,吉州的竹纸,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金溪的清江纸等等,都是见诸文人笔端的名品纸。此外,还出产一种裱纸,是宋人刻印书籍常用的纸张。

江西各州、军刻书业的盛况,在宋人的笔记及目录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南宋陈振孙《直斋

书录解题》，对所藏 5 万余卷书册，分为 56 编次，各详其卷帙多少，撰者姓名，并品评其得失，同时附记了刊印情况。由此可以得知，他所收藏的书籍中，有萍乡刻本、庐陵刻本、南康刻本、章贡刻本、九江刻本、建昌刻本、江州刻本、临川刻本、南安刻本、江西漕司刻本等 10 种版本，表明了这些地方有相当可观的刻书行业存在。此外，袁州的刻书业很值得注意。在《直斋书录解题》问世之前，晁公武已写出《郡斋读书志》，对四川转运使并宪孟赠给的全部藏书“躬自雠校，疏其大略”。后来陈振孙即仿其体而著《解題》。并氏赠书后散失，《郡斋读书志》独存。淳祐九年（公元 1249 年）袁州知州黎安朝，令袁州进士赵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增写附志一卷，于第二年（公元 1250 年）在袁州重刻，称为袁本。当时流行于社会的还有衢州刻本。这两种刻本有详略及文字差异。对这两个本子的优劣，历来多有评述，清代古籍鉴赏家、目录学家张元济认为袁本“撰录传刻，源流井井，非衢本所及。私窃以为袁本出而衢本可废矣。”非常可喜的是，公元 1250 年刻板印行的袁州本《郡斋读书志》，仍存于世，让我们在 700 多年之后，仍然欣赏到这部珍贵的宋刻古籍。该本书名《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分读书志、附志、后志、考异四部分，每页 10 行，每行 20 字。附志卷五末页末行刻“书表司刘瑜等楷书、刊字匠黄应等刊板”16 字，全书字体一致，楷书工整，刀法刚劲，美观大方。故不论其雠校精核，编辑公允，内容全面，即就版本而言，已是稀世瑰宝。庐陵刻书的生产能力也很强，有相当数量的刻板印书工匠在从事此项活动。官至宰相的周必大年老致仕家居之后，即雇募工匠刻书，先后刻印了自己的文集 200 卷和欧阳修的《六一居士集》150 卷，甚至刻印千卷大部头《文苑英华》。已知的这些事例，显示出江西刻书业在南宋日臻发达，对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书院，继唐末五代的基业，至宋代而大兴，显示出数量多、成效大的特色。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新创办的书院粗略统计为 136 所，其中北宋开办的 54 所（包括分不清北宋、南宋的），南宋开办的 82 所。北宋中期开始重视教育，提倡州县办学校，依光绪《江西通志》“学校”中所列州县名目统计，江西 13 州、军 68 县全部有学校，州（军）县学共计 81 所。学校和书院教育实施的结果，培养出了江西一大批优秀人才。据光绪《江西通志》所记进士名录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 5442 名，其中北宋 1745 人，南宋 3697 人，以 68 县平均计，每县约 80 人。收入《宋史》列传中的江西籍人士，有 220 余名，许多的出类拔萃者，不仅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左右时局，而且在思想、文学、史学、金石学、地理学、医学、天文历算等领域从事的研究著述活动，其著作之富，成就之高，同样领先于宋朝各路。唐宋古文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宋人占六位，三家在江西。词是宋代文学的主流，《全宋词》收作者 1300 人，江西约占十分之一。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得力于两个助手，一是高安人刘恕，二是新余人刘攽。司马光说，刘恕对《资治通鉴》全书的完成，“功力最多”。刘攽奉英宗之命校正《后汉书》谬误，不可胜算，写成《东汉刊误》四卷奏上。清江人徐梦莘广泛搜集史料，编撰成徽、钦、高宗《三朝北盟汇编》250 卷，将政和七年至绍兴三十一年共 45 年间的政府文书、官僚奏疏以及记序、碑志等史料，均以登录，为研究宋代抗金斗争和金朝制度风俗及宋金和战始末，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历史地理学专著以《太平环宇记》最著，作者宜黄人乐史。该书 200 卷，以太平兴国年间的版图为依据，广搜山经地志，精密考寻原委，记述经济文化状况；书中各州下列门类众多，新增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项，其体例为后来地方志所沿用；所载唐以前地志佚文，可补史籍缺略；所记五代、宋代史实，是研究北宋前期历史的珍贵资料。金石学，到宋代发展成专门的新学问。刘敞（新余人）、欧阳修是这门学问的代表人物，他们把金石资料纳入历史研究轨道，开启了古史研究的新途径。欧阳修根据收藏的大量古物和拓片，对碑刻铭文进行了细致考证，逐

洵

寰

一写出跋文,汇编成《集古录》10卷,内容包括“上自周穆,下更秦汉隋唐五代”的铭文碑刻400余篇,这是我国第一部金石学专著。波阳人洪遵把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生发出钱币学研究,著《泉志》15卷,专门研究古钱币,汇辑历代钱币图形,类分九品,颇称评博,《泉志》是我国最早的钱币学专著。刘敞不仅对古器物的研究尤有心得,且长于春秋学,撰《七经小传》、《春秋权衡》,摆脱传统章句注疏的束缚,开宋儒批评汉儒的先声。

宋代江西人才之盛,带来了著述之丰,他们各自以卓越的业绩,在祖国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7)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第一次执掌全国政权。夺取政权的战争对南北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立国后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歧视知识分子,又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样,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的繁荣自然难望唐宋的项背。但元朝统治者提倡汉族的经学,尊崇孔子,拨发专款雕印汉文图书,供学校使用,官刻图书遍及各地,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儒学,大都有刻书活动。江西刻板印刷生产能力,有宋代发展的基础,同样为元朝统治阶级所注重。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五月,元朝廷以大都刻印能力有限,不能刻印出大量的“历日”及时供各行省地方使用,下令“荆湖等处四行省所用者,隆兴印之”。朝廷给地方颁发“历日”,体现皇权至上和正统性,地方官府无权刻印。但元世祖居然批准江西隆兴刻印,这既是务实措施,也说明该地有很强的刻印能力。儒学典籍的刊刻也是一件大事。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十一月,集贤殿大学士、太保曲出建议:“唐陆淳著《春秋纂例》、《辩疑》、《徽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侵梓,以广其传”,得到元仁宗的批准。这些是官府授命的合法印刷。还有民间的非法印刷,也颇说明问题。据《元史·林兴祖传》称,铅山素多造伪钞者,且行使到江淮燕蓟广阔地域。能私刻元朝的通用钞票,姑且不论社会因素,单就刻印技法而言,也表明已经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了。

元朝江西著述者承前代之余烈,著作实绩及学术成就仍很突出。乐平人马端临以20余年之力著《文献通考》348卷,崇仁虞集等人将元朝典章制度汇编成《经世大典》880卷,丰城揭傒斯任辽、金、宋三史编修总裁官。成就大的应数高安周德清。他工北曲,晓音律,并痛感于当时戏曲界的时病,“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众”,动不动便引《广韵》为证。他据北曲用韵和北方语音,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写成《中原音韵》2卷,首先在吉安刊印流传。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全面论述北曲体裁、技巧和音韵的专著,后来北曲作家、演员作词唱曲,正音咬字多以此书为依据,至今仍然是研究近代普通话语音的重要参考著作。在医著上成就显著的人有南丰危亦林,他积十年之功,撰写出《世医得效方》20卷。其中正骨的医述尤为独创,所记“悬吊复位”法比英国达维斯1927年提出的悬吊法早600年;用“草乌散”(用蔓陀罗花配制)进行全身麻醉的技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世医得效方》获元朝官府批准,成为全国使用的医疗手册。

(8)明朝,朝廷削书税,开书禁,并命人在全国搜集整理图书典籍,还命礼部派员到南京(明初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征调典籍图书。中央官府对图书的重视,无疑给全国出版业的发展造成了良好环境。在一些富庶地区私家藏书蔚然成风,大量的藏书既为出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文人学士的著述活动拓宽了领域。江西出版业形成了官府、书坊、私刻并驾齐驱的局面。在800多种明朝江西出版物中,戏曲作品尤为突出。汤显祖回乡为民创作的戏剧《玉茗堂

四梦》，给近于僵化的传奇注入了新的血液，且至今演唱不衰。汤显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明朝除官修史书外，私修史书也比较多，如高安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吉水陈诚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祖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名著，该书由其好友徐伯聚刊印，流行于世。全书分 18 卷，123 幅插图，图文配合，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保存了珍贵资料。

(9)清代江西木刻印刷业的典型，是金溪县浒湾镇刻书业。浒湾刻书，始于明代，清代康熙以后进入鼎盛时期，嘉庆以后，长期饮誉全国刻书行业。同治年间，这里有铺栈、书店 60 余家，资本雄厚的商铺在九江、南昌、芜湖、安庆等地开设分店，有“书肆遍天下”的声誉。清王朝进行文化专制，非常重视这个书籍刻印和销售的名区，同治十一年四月立《禁书碑》于浒湾书铺街，“严禁淫词小说”《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今古奇观》、《笑林广记》等，凡两百余部。但是，浒湾镇仍然成为全国著名的图书集散地之一，除继续保持“前店后坊”的生产方式外，利用流动商贩和固定店铺扩大图书销售，逐步形成了与刻书业相分离的图书发行业。在这之前的书肆、书坊，几乎都编、印、发合为一体。

清代江西学子仍源源不断通过科举走入社会，著述之多不亚于明代。有词集的作者超过 150 人。文学戏剧首推铅山蒋士铨，他一生崇拜汤显祖，家居教学 10 余年，倾心于诗词戏曲创作之中，一生创作杂剧、传奇 16 种，诗集 27 卷，词 2 卷，《忠雅堂文集》12 卷。他的《临川梦》写汤显祖生平，实为自抒胸臆；《冬青树》写文天祥抗元事迹，弘扬浩然正气。峡江萧腾麟著《西藏见闻录》，是清代前期西藏地方史的权威著作。

在明清两代，由于频繁进行的反抗与镇压，兴衰往复的乡邦变迁，促使人们仔细琢磨本地的演变历程和各种举措的利弊得失，提出了一些见仁见智的看法，编纂出了一大批府县志书，积存不少珍贵的研究资料。江西省志在明朝修 3 次，清朝修 5 次（刊印成书 4 次）。江西现存 500 余种府县（州、厅）志，其中大多数是清代编修的。明代的府县志书留存于世的已经不多，但是仍可找到十三府中任一府的府志，《袁州府志》3 种，临江、抚州、吉安、瑞州、赣州各 2 种，其中最早的是弘治十六年（公元 1503 年）刻印的《抚州府志》。清代同治年间是江西历史上府县志书纂修最全的时期。除县府修志外，还有私人编写的，如明代泰和人郭子章的《豫章书》122 卷，以史体写成，分大记 20 卷、志 22 卷、表 10 卷、事纪 2 卷、列传 68 卷，实际是江西全省的总志。此举实属不易。省府县志之外，还编纂了不少书院志、寺庙志、山志等，如《白鹿洞书院志》、《白鹭洲书院志》、《庐山志》、《龙虎山志》、《阁皂山志》、《疏山寺志》、《鹅湖寺志》等等。这些专门性的志书，对研究古代书院文化、佛道宗教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整理江西地方文献，也是先贤们的一大劳绩，如杨希闵编写豫章九家年谱和《乡诗摭谈》，曾燠纂辑《江西诗征》，陶福履和胡思敬编辑前后两种《豫章丛书》，王谟编纂《豫章十代文献略》，晏棣撰写《国朝（清）书画名家考略》等等，对这些难能可贵的私人劳作成果，江西出版志不能不提及他们。

(10)北宋至清代，朝廷重视出版业管理。清政府出于钳制人民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需要，对出版物的管理和控制尤为严厉。清末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特设“印刷总局”，负责管理书报刊等出版物，江西由地方官署办理。清代屡兴文字狱，禁书不绝，江西是禁书的重点地区，案子最多，杀人最多，株连最众。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开展查办禁书，从乾隆 19 年至 57 年，清查了 19 年。各省州县衙门设立查书局，负责查办本地的藏书及书肆之书。凡经查

出的违碍书籍,部分被删削,多数被销毁。江西省凡17次,共奏缴452种。江西巡抚郝硕仅一次即奏缴168种,计1480部,8705本。在这些书中,或是写了明末辽东战事,暴露了清朝隐讳的一些人事;或是说到杨廷麟赣州抗清斗争,记有清兵屠杀暴行;或者有“辮发”的字句;或者有已被处死者的诗文,都被加以“指斥”、“违碍”、“狂悖”等罪名,被禁毁掉(具体书目及作者姓名,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11)鸦片战争后,历史进入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军事侵略日益加剧,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益暴露。国家大局在变,江西地区不能不变,而且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各种社会因素的集合,形成为阻滞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的惰力,把江西从前列的地区拉向落伍。但在动荡剧变的政治局势下,出版业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利用著述活动鼓吹宣传西方文明,揭露抨击封建制度,他们为国难深重而忧,为改革维新而鸣。黄爵滋、刘绎、桂念祖等在当时都有名气。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廷下令各省恢复书院,并允许各地筹措经费选择急需的图书加以利用,到光绪年间,全国共有官书局24处,江西在这之前即1872年建立了“江西官书局”。官书局出版的图书,除大部分是维护封建制度的读物外,也有一些介绍欧美政治思潮和中国经济状况等类图书,如《欧美政治要义》、《中外輿地全图》、《中国经济全书》、《江西政要》、《农桑略述》等。

1891年,九江华中书馆从上海、汉口购进小型印刷机及浇版铸字设备,首开江西铅印之先,随后,官书局、南昌生记印刷所、江西官纸印刷所、刻书家胡思敬等各类铅印、石印厂家纷纷出现,官刻、坊刻、私刻急剧萎缩,江西印刷业进入传统印刷技术与近代印刷技术新旧交替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一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传教的特权,放肆地进行文化侵略,人民的“反教”与帝国主义的“护教”之间的斗争此伏彼起。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外国传教士在九江创刊的《The Church Advocate》(意为《护教者》,月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是江西至今有资料可查的第一份期刊。

(12)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江西先是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然后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全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章。这一时期,江西出版业一部分在国民政府统治区(以下称国统区),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的地区。

国统区内的出版业,因出版机构政治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复杂的状况。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系统设立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物除经济类外,大量的宣传奴化思想,为着实行国民党的文化统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用隐蔽等方式,创办书店,坚持出版发行革命的、进步的图书。还有一类出版机构,原是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后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转变立场,投身革命,其出版物的性质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的地区,是指在江西的中央苏区、省际间建立的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据统计,在这些地区从事出版活动的机构近200家,主要分布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粤边红色根据地、紫瑶山游击根据地等。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各种物资严重缺乏,但出版工作者想方设法,编印出各种革命图书,为苏区和根据地人民提供精神食粮。在闽浙赣苏区,每10天出一小册子。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